

# <梁英明印尼生活回忆> 之一

1931年5月28日,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文化名城梭罗市。父母都来自广东新会。

岁月匆匆,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往事历历,却又依然恍如昨日。

在那个特殊的火红年代,在美丽的椰岛之国,曾涌现一大批热血沸腾的爱国华侨青年。我不过是那个时代洪流中的一个小水滴。然而,从梭罗河畔的快乐童年,到雅加达的战斗生活,都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因为它映照出我成长的足迹。

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从印度尼西亚到整个东南亚华侨社会出现了左右两派分化以至对立和争斗。这正是我从少年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的过程。青年学生成为争斗的主力军,是那个时代所决定的。当年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和革命积极性,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潮流和前进方向。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往事,回忆走过的道路,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满腔热情,当然也已认识到自己的天真幼稚甚至某些过激思想。当然,历史既不可能抹去,时代也不会重现,我们只能在不断反思中进步。

## 梭罗中华学校

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华侨人数众多,历史悠久。他们大都来自广东和福建农村,未曾受过什么正规学校教育。为了让后代不至于数典忘祖,华侨的众多同乡会分别兴办了自己的私塾,用方言讲授四书五经等中文典籍。直到1901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会馆创建了中华会馆学校(简称中华学校),印度尼西亚华侨才拥有了第一所现代华文学校。与过去的私塾不同的是,巴达维亚八帝贯律的中华学校(简称八华学校)使用国语授课,课程内容也不限于四书五经,而是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音乐、体育等。其后,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同样的现代华文学校,而且都称为中华会馆学校(Sekolah Tiong Hoa Hwee ko-an),1904年,梭罗中华学校创立。1938年,我开始在梭罗

中华学校读书。

我上学的时候,梭罗中华学校还只是一所小学,全校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共有学生约200名,教师十几名。校长是陈梗才老师。各地中华学校在20世纪初年创立时,师资都很缺乏,教师水平也不高。1907年,清朝在南京市创办一所专门招收东南亚华侨学生的学校,称为暨南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暨南学校(中学),1928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后,又发展为暨南大学,仍以招收华侨学生为主。印度尼西亚一些华侨子弟从暨南大学毕业后,返回印尼各地中华学校担任教师。到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梭罗中华学校已有好几位老师是暨南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我至今还记得的有校长陈梗才及数学老师侯长龄和英文老师林警良等。

20年代后期开始,来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他们除在原有的中华学校任教以外,还创建了更多的华侨学校,例如梭罗华侨公学等。中华民国政府曾对海外华侨学校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还指定上海开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出版专供海外华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因此,华侨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都是与中国国内的学校“接轨”的。但是,各地的中华学校比其他华侨学校似乎更加注重英文课程水平。例如,梭罗中华学校三年级就开始有英文课,用的是英国出版的教科书,称为“Royal Crown Readers”,它的内容比中国开明书局出版的英文教科书更艰深一些。

刚开始上课时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只记得一、二年级的时候,班里考试成绩最好的都是女生,男生似乎只知道玩。从三年级开始,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进步,从此每个学期考试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父亲忙于店里的工作,没有时间督促我学习。只有当我在学期末把成绩单带回家来给他看的时候,他才高兴地称赞我几句。每天上学前,父亲都给我一分钱的零花钱。当时,这一分钱可以买一小卷的糖果或者一杯冰汽水。学校门口就有卖零食的小摊商。

我在中华学校无忧无虑

地读到小学四年级,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梭罗时才被迫辍学。

## 结缘羽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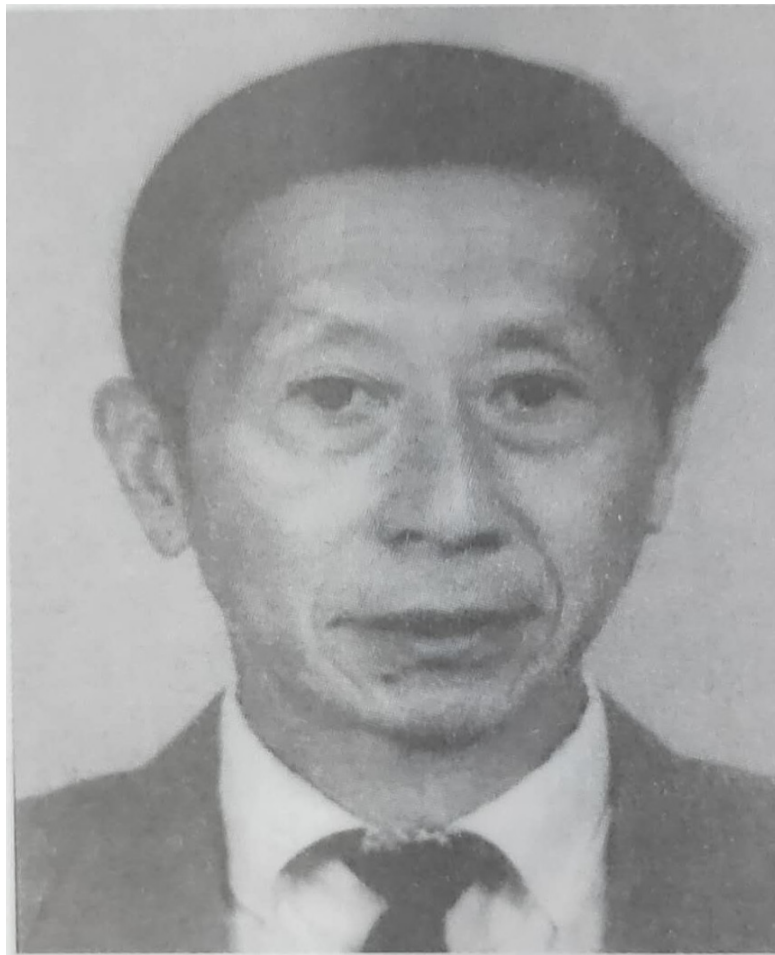
在中华学校读书期间,令我最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我开始学打羽毛球。直到今天,羽毛球仍然是我喜爱和坚持的运动。

也许因为当时中华学校的学生不太多,我们的校长与学生家长之间经常有联系。记得在我升入四年级的时候,陈梗才校长就曾来到我家。他对我父亲说到我的学习成绩良好,要我多参加体育运动,并建议我打羽毛球。

实际上,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当时,学校有两张乒乓球桌,还有一副单杠。我在课间休息时,就常和同学打乒乓球,或自己在单杠上玩。学校的大厅里有乒乓球桌,还有球拍和球供我们玩,而学校的操场虽有两块沙地羽毛球场地,学生打球却要自备羽毛球拍和羽毛球。因此,我此前从未打过羽毛球。

父亲听从陈校长的建议,给我三盾钱,让我自己去买一把羽毛球拍。我当然很高兴,便立即到一家华侨开设的“廉价百货商店”(Toko Obral),花两盾半[“盾”(rupiah)是荷属东印度的货币单位,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仍使用nupiah为货币名称]买了一把“邓禄普”(Dunlop)牌羽毛球拍。邓禄普是著名的英国体育用品品牌,邓禄普公司生产的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和网球拍都是当年享誉世界的名牌产品。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从接触羽毛球以后,就迷上这项运动,乒乓球就打得少了。学校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我必到学校打羽毛球。一起打球的小伙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羽毛球运动奠基人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他们和我年龄相仿,但当时已掌握很好的球技,而我则是新手。因此,我总是打不过他们。然而不久以后,我们三个人的技术可以说已是不相上下了。正好我和陈福寿的家相距不远。我们打听到在我家附近一家华侨开设的“胜商店”(Toko Menang)里,有



梁英明

几位青年店员常在星期天到商店后面的梭罗河畔打羽毛球,于是我们就加入他们的队伍。每个星期日早晨我起床后,自己吃两块点心,就在门口等陈福寿过来,然后一起去打球。在那些打球的成年人当中,有一位叫许硕文的球技最好。我们都叫他“硕文哥”。这位硕文哥不但技术好,还热心教我们这两个小孩子打球。硕文哥的球技灵活多变,尤其善于运用假动作,让对手防不胜防。快速反应的“假动作”至今仍是东南亚羽毛球运动员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说,硕文哥是我们的启蒙老师。

## 梭罗广肇会馆

东南亚早期的中国移民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相互帮助而成立了各种同乡会。这些同乡会给新来的乡亲们提供临时住所并介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梭罗主要的华侨社团就是四个同乡会,即客属公会、和合会馆、玉融公会和广肇会馆。其中,广肇会馆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个。父亲尊崇孙中山先生,信奉三民主义。“九一

八事变”后,父亲参加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热心为同乡服务,受到大家尊重,曾长期担任广肇会馆主席,直到1962年病逝。

大约从1940年开始,父亲让我和弟弟参加广肇会馆的武术班。武术班有十来个人,大多是小学生,晚上在会馆训练。教我们武术的是林振光师傅。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林师傅是一位武术高手。他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从不责骂我们,但要求很严格。我们跟林师傅学了空拳、长棍、长枪、三节棍、长凳和双刀等套路。

舞狮是广东人的习俗,因此梭罗广肇会馆也有一支醒狮队。广肇会馆的醒狮队逢年过节都要出动,到一些广东人的商铺拜年。商家会送红包作为会馆的活动费。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梭罗的华侨也以“赈济祖国难民”的名义积极筹款支援祖国抗日。此后,广肇会馆,狮队向商家拜年的目的就是为祖国抗日战争筹款。到1941年,我已经10岁,林师傅认为我的武术学得还不错,于是从武术班中挑选我和我的表兄加入醒狮队。